

西北考古文獻 第一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第六輯

西北考古文獻

第一卷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編

新華書店
PDG

前言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是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正編)之後又一部補充性的西北文獻資料總集，是全國文獻叢書工作指導委員會統一規劃下，由《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和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共同組織完成的一項古籍整理的巨大工程，它以發掘、搶救為手段，以保護、研究為宗旨，在係統整理的基礎上全面反映和再現了中國西北現存古籍文獻的全貌，與《正編》一起基本形成了西北文獻的主要構架。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的編纂工作終於完成了。本編共收錄新疆歷史文獻一百〇三種，約二千五百萬字，內容主要涉及新疆歷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文化、民族、宗教等各個領域。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與正編不同。正編所收錄文獻的內容涉及西北五省區，而二編則以新疆歷史文獻為主。我們之所以這樣安排，主要是考慮到讀者的方

便。一般說來，研究地方史或查閱某一地方的文獻，首先應從某一省區開始。內容愈集中，愈便於查閱。因此我們將在編纂《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三編、四編、五編時，以省區爲單位進行編纂。

在編纂《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的過程中，我們盡力收集各種文獻，在『全』字上下功夫。凡是與新疆歷史有關的文獻，不管篇幅長短，不限內容體裁，不論文字種類，祇要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我們都盡力收錄其中。所以，在我們收錄的各種文獻中，既有洋洋百萬餘言的資料匯集，又有幾千字的文告通電；既有官方文書，又有私人著述、奏稿奏議；既有漢文文獻，又有少數民族文字文獻。如果加上正編所收錄的新疆歷史文獻，可以說有關新疆的歷史文獻基本上都被收錄到了《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之中。

在編纂《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收錄反映各種不同思想觀點的文獻，力求從不同角度把握歷史發展的脈絡，在『求實』上下工夫。衆所周知，一八六四年新疆各族農民起義後，各種矛盾錯綜複雜，階級矛盾、社會

矛盾，以及中華民族與外國侵畧勢力之間的民族矛盾互相交織在一起。人們看問題的角度、立場不同，所得結論自然有所不同。正因為如此，我們不僅在正編收錄了官方編纂的大型資料匯集《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畧》等文獻的基礎上，又收錄了《勘定新疆記》、《劉襄勤公奏稿》等，而且還收錄了反映該時期新疆歷史的少數民族人士的個人著述，如《安寧史》、《伊米德史》、《塔蘭奇史》等。我們相信，大家在閱讀這些文獻時，也會客觀、求實地理解其中的某些觀點。

在編纂《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的過程中，我們努力發掘各種文獻，在『求新』上下工夫。這裏所說的『求新』，主要是指在收錄那些稀見文獻上下工夫。為此，我們廣泛搜集信息，爭取各兄弟圖書館的支持和幫助。本編中，有不少重要文獻，如《補過齋日記》等，屬於首次公開刊佈。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新疆省主席張治中的重要文告，已經是今天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積澱豐厚，各種文獻浩如煙海，這是祖先畱給我們的一筆寶貴財富，西北文獻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西部大開發的進程中，我們

急需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這些重要文獻，一定會在新的形勢下，重放異彩！

在編纂《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的過程中，我們雖然在求全、求實、求新上下工夫，但由于地處邊陲，新疆各圖書館藏書有限，加之時間倉促，遺漏在所難免。這一點也請讀者見諒。

本編第一、二、三、四、六輯由新疆社會科學院苗普生、劉國防、陳霞、趙國慶集體編纂。第五輯由西北民族大學高人雄、羅康泰編纂。苗普生統編全書。

編者

二〇〇五年歲末

綜 述

就內容而言，考古文獻包括兩類，一類是考古發掘報告，另一類是對發現於地上地下各種文物的專題研究。一個地區考古文獻的多寡、優劣與該地區考古事業的發展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十九世紀末，利益驅使下的尋寶、挖寶活動拉開了新疆考古工作的序幕，蜂擁而至的各國考察隊、探險隊的盜掘一度使新疆的『考古活動』熱鬧非凡，與內地其他地區相比，解放前新疆考古文獻具有以下二個明顯的特點，一是這一時期科學規範的考古發掘報告極少，能夠作為考古發掘報告的多是那些記述考察隊、探險隊盜掘經過和收獲的『收藏品報告』、『考察報告』、『探險報告』、『旅行記』等；二是外文考古文獻遠遠多於漢文考古文獻，涉及的文種有英、法、俄、德、日文等，其原因是因為國內考古工作者幾乎沒有條件從事新疆考古發掘，那些從事新疆古物研究的人大多祇能間接使用新材料，因而這一時期的新疆漢文考古文獻少於外文考古文獻。

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正編）第七輯《西北考古文獻》及《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續編）中，收錄的出版於解放前的新疆考古文獻僅有以下幾種：羅振玉的《流沙墜簡》、黃文弼的《高昌磚集》和《高昌陶集》、陳夢家的《漢簡綴述》、裴文中的《新疆之史前考古》。在二編中，能夠進入收錄範圍的考古文獻數量更少，但爲了能夠全面地反映解放前新疆的考古活動，我們除收錄羅振玉的《西陲石刻後錄》外，特意把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馮承鈞譯的《西域考古舉要》和一九五八年黃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一并收錄，原因是這兩本書都是解放前新疆考古活動的記述，前者是法國人郭魯柏的著作，它記述了斯坦因三次西域考察之成果及斯坦因以前諸考察團在新疆考察之經過，後者爲作者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在塔里木盆地考察的記錄及搜掘的遺物匯總。另外，在這一輯裏我們還將夏雨譯的《新疆古城探險記》（薩維·漢丁著）收錄進來，因爲這一遊記除了記述塔克拉瑪幹的沙漠及其周圍的風土人情外，還記述了沙漠裏的古城情況。但爲了全面了解解放前新疆的考古文獻，我們在這裏有必要全面概述一下

這類文獻的情況。

在外文考古文獻中，由於斯坦因、斯文赫定、奧登堡、格倫威德爾、勒柯克、伯希和、橘瑞超來到新疆考察，探險獲得的古物豐厚，因而他們在新疆的工作『成就』——旅行記和各種報告就成了了解前新疆考古發掘報告類文獻的重要部分。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一九〇六—一九〇八、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英人斯坦因先後三次來到新疆，第一次主要盜掘和闐、尼雅兩地的古代遺址；第二次他沿塔裏木盆地南緣，盜掘了樓蘭和米蘭遺址，之後在敦煌附近長城的烽火臺下，掘得大量漢簡，並從王道士處購得莫高窟藏經洞裏的珍貴文物，之後來到吐魯番、焉耆、庫車，經喀拉墩又回到和闐，發掘了老達瑪溝、麻札塔格古堡後，經阿克蘇、巴楚離開新疆；第三次他從塔裏木盆地南緣東行，發掘了和闐、尼雅、樓蘭、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瓦石峽等地古代遺址，後到莫高窟，又獲得大批藏經洞裏寫本，在盜掘黑城子西夏古城後來到吐魯

番，盜掘了阿斯塔那古墓，揭取了伯孜克裏克石窟壁畫，然後在庫車進行了調查發掘，最後去伊朗考察。三次新疆考察他先後出版了兩本旅行記——《沙埋和闐廢址記》（一九〇三年在倫敦出版，一九九四年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了漢譯本）、《沙埋契丹廢址記》（一九一二年在倫敦出版）和三本報告——一九〇七年的《古代和闐》、一九二一年的《西域考古圖記：在中亞和中國西陲考察的詳細報告》（二〇〇〇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漢譯本）和一九二八年的《亞洲腹地考古記：在中亞、甘肅和東部伊朗考察的詳細報告》（二〇〇二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漢譯本）。斯坦因在新疆的三次盜掘收穫極大，他的旅行記和考古調查報告是解放前新疆考古文獻中最為重要的。解放前王國維曾將斯氏一本名為《中亞細亞探險談》的書譯成漢文出版，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曾出版過向達翻譯的斯氏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斯文赫定是著作等身的瑞典探險家，他在新疆的考察始於一八九三年，終於一九三五年，雖然考古非其所長，但他也獲得不少新疆的古代文獻和文物。

他的旅行記性質的《穿過亞洲》（一八九八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出版）一書記述了他第一次考察新疆的經過，正式的考察報告《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中亞旅行的地理科學成果》於一八九九年出版。第二次考察新疆，他出版了八卷本的《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中亞科學考察成果》，其中的《塔裏木》和《羅布泊》（王安洪、崔延虎將其譯為漢文，名為《羅布泊探秘》，一九九七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飲譽當時的名著，在《羅布泊》一書中有發現樓蘭古城的記錄。這套書的第六卷為考古學分冊，一九二〇年這一分冊以《斯文赫定樓蘭所獲漢文文書和零星文物》為名出版。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斯文赫定組織領導了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瑞科學考察報告》（全名為《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報告集——中瑞聯合考察團》）是這次考察活動的結晶，這個報告的導言就是斯文赫定撰寫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王安洪已將其譯為漢文，一九九二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次考察團成員貝格曼撰寫了《新疆考古研究》，記錄他的考古工作成果，一九九七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社出版了這本書的漢文版。解放前我國出版過漢文的斯氏的《長征記》（李述禮譯，一九三一年）、《亞洲腹地旅行記》（李述禮譯，一九三四年）、《我的探險生涯》（孫仲寬譯，一九三四年）。

從一八九八年起，俄國人克萊門茲、科卡諾夫斯基、別列佐夫斯基、奧登堡先後率領考察隊進入新疆，他們在吐魯番、焉耆、庫車盜掘，所獲頗豐。一八九九年克列門茲用德文撰寫出版了他的考察報告《一八九八年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吐魯番考察報告》。科卡諾夫斯基考察隊的工作成果反映在奧登堡編撰的《科卡諾夫斯基博士自吐魯番所收集的古物簡明目錄》一書中。奧登堡所率考察隊的收獲記錄在他撰寫的一份題為《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俄國突厥斯坦考察》的簡報中。應該指出的是，俄國在吐魯番進行的三次盜掘，除克萊門茲有較詳細的報告外，第二、三次祇有奧登堡撰寫的簡明目錄和簡報，詳細情況一直不為研究者所知。

德國是獲得新疆藝術類文物最多的國家，從一九〇二年起，格倫威德爾和

勒柯克先後組織了三批吐魯番考察隊，第一次獲得四十四箱古代藝術品和出土文獻，一九〇六年出版了這次考察報告《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亦都護城及周邊地區考古工作報告》。第二次勒柯克獲得了二百箱古代藝術品和出土文獻，一九〇九年他在這一年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用英文發表的論文《普魯士皇家第一次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緣起、行程及收穫》記述了這次考察情況，一九一三年他編印了大型圖錄《高昌——普魯士王國第一次吐魯番考察重大發現品圖錄》。第三次的考察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由庫車、焉耆進入吐魯番，一路獲得二百多箱古代藝術品和出土文獻，一九一二年格倫威德爾出版了《新疆古代佛教聖地——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在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綠洲的考古工作》一書，記載了這次的工作『成就』，一九二〇年他的《古代龜茲》一書也可以看作是他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的考古報告。一九二六年他還出版了第二、三次考察的個人旅行記《新疆古希臘化遺跡考察記——德國第二、三次吐魯番考察報告》，一九三四年鄭寶善根據這本書的英文版將其漢譯為《新疆之

文化寶庫》，由南京蒙藏委員會出版，一九九〇年《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正編將其收入，一九九九年陳海濤又將這本書譯出，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勒柯克除了在吐魯番盜掘遺址、切割壁畫外，在庫車先後獲得三批共計四百餘箱古物，《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國第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探險報告》是這次考察活動的記述，此書一九二八年在萊比錫出版。

日本的大谷探險隊先後三次到新疆進行調查發掘，第一次（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年）渡邊哲信、堀賢雄涉足過葉城、和闐、阿克蘇、庫車、吐魯番的遺址和古墓，一九〇四年五月攜帶收集品回國。第二次（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橘瑞超、野村榮三郎二人從北京出發，越過阿爾泰山，由烏魯木齊進入吐魯番，在這裏進行了盜掘，然後橘瑞超南下羅布泊，考查了樓蘭古城，野村榮三郎經庫車、阿克蘇，兩人在喀什噶爾會合後帶着得到的古物回國。一九一〇年橘瑞超再次來到吐魯番進行挖掘，之後到米蘭遺址剝取了那兒的壁畫，然後到和闐進行盜掘。一九一二年吉川小一郎也來到新疆進行調查，一

九一四年他的回國結束了日本人在新疆的考察。由於大谷探險隊的成員多為年輕僧侶，缺乏基本的考古學知識，都沒有將他們調查盜掘的情況整理成報告出版，僅有一些遊記。橘瑞超的第三次考察記錄在一九一二年東京博文館出版的《中亞探險》一書，吉川一郎的《支那紀行》和其他成員的原始記錄主要刊佈在上原芳太郎編的由有光社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新西域記》上下卷中。橘瑞超的探險報告由柳洪亮將其譯成漢文，一九九九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堀賢雄的《西域旅行日記》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由白水社出版。

法國人伯希和於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在新疆考察，他先到喀什，之後沿絲路北綫向東，先後在巴楚圖木舒克、庫車地區盜掘。他在新疆的主要收獲就是巴楚和庫車的所得，他的兩次講演報告《高地亞洲三年》（載《法國亞洲委員會通訊》一九一〇年一月號）、《伯希和考察隊中國突厥斯坦考察報告》（載《法國金石銘文學院學報》一九一〇年號）可以看作是他的考察報告。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韓百詩等人編撰整理了他的這次考察報告，出版了《伯希和考察隊考古資

料叢刊》第一卷《圖木舒克》（圖版）、第二卷《圖木舒克》（解說）、第三卷《庫車遺址：都勒都爾阿護爾和蘇巴什》（圖版）、第四卷《庫車遺址：都勒都爾阿護爾和蘇巴什》（解說）、第八卷《庫車地區諸遺址·龜茲語銘文》等。

解放前我國學者除黃文弼外幾乎沒有人在新疆進行過科學的考古發掘。作為斯文赫定領導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黃文弼先後於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兩次在吐魯番發掘，獲得了大批墓磚，還從當地人手裏購得一些文書。他的發掘簡報《高昌·第一分冊》一九三一年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之二『考古學第一輯』在北平出版，正式的考古報告《吐魯番考古記》十多年後出版。他的考察日記《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黃烈整理）一九九〇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一時期國內除了翻譯了斯坦因、斯文赫定的考察行記、報告外，還翻譯了瑞典人薩維·漢丁的《新疆古城探險記》（夏雨譯，東南出版社出版，一九四〇年）。隨着考察、探險者旅行記、考察報告的出版，新疆的另一類考古文獻——

——對各種出土文獻、文物的專題研究也逐漸展開了。從研究的水平看，可以說國內外此方面的研究都是處於起步階段，這一時期此類研究主要是對考察、探險家們獲取的古物整理後所編輯的各類目錄、介紹，如：呂德斯一九一三年在柏林出版了《伯孜克裏克第九座寺院裏的繪畫》，H. H. 安德魯斯一九三三年在新德裏出版了《斯坦因在中亞和昔斯旦古寺廟中發現的壁畫》、一九三五年編輯出版了《斯坦因考察中亞、甘肅和東伊朗時發現的文物目錄》、《斯坦因所獲古物圖錄》，H. 沙畹一九一三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等等。除此之外，這一時期尚有一些研究性的論文、專著問世，如：勒柯克一九一一年發表了《摩尼教高級法庭法官的陳詞》，呂得斯一九一四年發表了《論東突厥斯坦文學發掘品》，波伊爾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的佉盧文書》，H. 沙畹一九一三年在巴黎發表了《在中國發現的一份摩尼文契約》，N. 哈特曼一九〇五年在柏林發表了《葉爾羌出土的一份突厥文書》，A. F. R. 郝恩勒一九〇六年在牛津出版了《在新疆發現的佛教